

清代

民间信仰与景观研究

——以陕西太白山神为例

僧海霞◎著

非外借



科学出版社

清代

民间信仰与景观研究

——以陕西太白山神为例

僧海霞◎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清代陕西太白山及其相关意象为对象的雨神信仰为研究对象，介绍清代陕西雨神发展概况和太白山神信仰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太白山神信仰景观及其分布，并对信仰、景观与区域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论述。同时，通过对太白山神信仰在清代陕西地区由盛转衰过程的展示，探讨民间信仰演变的轨迹和影响其演变的因素。

本书可供历史地理学、文献学等专业的师生阅读和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代民间信仰与景观研究：以陕西太白山神为例 / 僧海霞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6

ISBN 978-7-03-061367-7

I. ①清… II. ①僧…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研究-陕西-清代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04598 号

责任编辑：任晓刚 / 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润一文化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9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8

字数：280 000

定价：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清代陕西雨神信仰概述	24
第一节 清代陕西雨神信仰产生的基础	24
第二节 清代陕西雨神分布及特征	35
第三节 求雨活动行为人群体的变迁	46
第四节 自然环境差异下的求雨仪式	60
第五节 雨神景观及其分布	74
小结	89
第二章 太白山神信仰的起源、发展与传播	91
第一节 太白山神信仰起源	92
第二节 太白山神信仰的发展	105
第三节 清代太白山神信仰的空间特征	118
第四节 上下之间：太白山神信仰传播趋势	128
小结	146



第三章 太白山神信仰景观	148
第一节 信仰源区的自然景观	149
第二节 信仰源区的人文景观	156
第三节 信仰核心区的太白庙景观	170
第四节 信仰边缘区景观的分布及与核心区的差异	177
第五节 太白山主体信仰景观变迁与机制	188
小结	200
第四章 信仰、景观与区域人文环境	202
第一节 信仰的政治化	203
第二节 信仰的世俗化	216
第三节 信仰与景观的对应而不对等	227
小结	262
结语	265
参考文献	269
后记	279



列表目录

表 1-1	清代帝王求雨情况统计表	28
表 1-2	雍正时期陕西雨神庙统计表	80
表 1-3	雍正时期陕西雨神庙类型统计表	85
表 1-4	清代中后期陕西雨神庙统计表	85
表 1-5	清代中后期陕西雨神庙类型统计表	87
表 2-1	清代中期关中地区太白庙分布表	112
表 3-1	清代太白山地名情况表	157
表 4-1	清前期太白山神求雨活动统计表	230
表 4-2	雍正年间陕西太白庙分布表	231
表 4-3	清代中期陕西太白山神求雨活动统计表	233
表 4-4	清代中期陕西新增太白庙统计表	235
表 4-5	清代后期陕西太白山求雨活动统计表	238
表 4-6	清后期陕西新增太白庙情况表	239
表 4-7	明代陕西太白庙情况统计表	249
表 4-8	清代新建太白庙承建者身份统计表	252
表 4-9	清代重修太白庙者身份统计表	252
表 4-10	清代位于州县治所的太白庙统计表	254



绪 论

一、缘起及研究意义

（一）缘起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社会，求雨习俗十分兴盛。但是求雨并不能导致降雨，也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旱灾威胁。然而在民众的意识里，天旱求雨是习惯使然。这种习俗缘何长期存在于区域社会中，值得我们探究。

由此，我想起儿时的经历。20 世纪 80 年代初，每遇干旱，村民会自发敲锣打鼓，到距村庄五六里的一个名为九龙洞的山间溶洞求雨。为首者多为村中头面人物，随从是各家各户的代表，以及无所事事的孩子们。祭拜者烧香、下跪、磕头，口中念念有词，并用所带瓶子在溶洞中接水，接到一定量的水后，求雨者自行离开。此后是否还有其他活动，我已经没有记忆。我的家乡位于河南西部的山区，求雨所选择的溶洞在当地较为罕见，洞内有一条暗河从山前流出。神秘的山洞，无法触摸的神明，对点着蜡烛进洞的儿童来说，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儿时已经远去，久久不能忘却的，却是那个最早进入我的记忆，与求雨有扯不断理



还乱关系的九龙圣母和关于她的神奇传说。

我曾经呆过三年之久的金城兰州，郊区山中家家户户有水窖，保存泛有绿意的雨水。当地民众对发绿雨水的珍惜，让我这个经历过求雨活动的河南人感到不可思议。当我求学西安之后，翻检方志时，发现在清代的陕西，有一些形形色色的求雨地点和神明，还有规模大小不等的求雨活动，以及林林总总的与求雨相关的庙宇，这一切似曾相识，却又不尽相同。

旱时盼雨，几乎成为我所生活过的地区的共同经历，这使我对传统社会中旱灾来临时民众的情感 and 行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于内陆地区的民众，在没有任何科技手段获取雨水的情况下，他们经历了什么？在反复的经历中，他们认知了什么？又在进行何种努力？如何选择而最终又怎样放弃，都成为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陕西是我生活过的三个省份之一，是我国从东南湿润区域到西北干旱区域之间的过渡带。传统社会末期，祈雨作为一种存在于中国绝大部分版图上的民俗事象，在陕西也普遍存在。

清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和近代社会的开端，陕西的求雨习俗在这个交替的朝代中发生的变迁，成为我们解读陕西区域社会的一条路径。在怎样的情形下，民众选择了求雨；在何处求雨，是民众选择神明的结果；怎样求雨，反映了区域社会民众的信仰习惯；求雨之后民众的反馈则表达出信仰情感的变化，这种情感在区域社会中如何表达；区域社会则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受这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进行了哪些响应和调整，这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解读，对当今干旱半干旱地区民众抗灾心理的认知是有所裨益的。

（二）研究意义

求雨习俗的存在源于民众对雨神的崇拜，雨神崇拜的根本在于干旱气候的出现。干旱是雨神信仰的根源，却不具有唯一性。求雨活动的出现，有着特定的时间特征，与区域人群的认知密切相关，而求雨对象则因地制宜。清代陕西是中国农业发展较为充分的地区，人口迅速增加，农业迅速拓展，使得人地之争更趋严重。同样的耕地承载更多的人口



时，民众对土地的出产率产生了更高的期望，农业用水的缺乏也就日趋明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代陕西的求雨活动就显得更加突出，求雨所涉及的神明除国家祀典规定的龙王外，更多的是民间神明。对一个高层政区而言，所信奉雨神的不尽相同，是区域社会多样性的表达之一。因此，我认为对民间信仰的探讨，是解读求雨习俗的开端，也可为区域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依据。

雨神崇拜是民间信仰的一种。民间信仰的产生、传播及其衰落是民众对环境感知过程的见证，这是一个从朦胧到清晰的渐进过程。民间信仰的功用是多重的。谭其骧先生认为：“控制当时（明代——笔者注）整个社会精神的，是菩萨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①对信仰社会控制职能的认同是已有研究成果中的一项，这种职能至传统社会末期更为明显。周振鹤先生认为：“中国的宗教意识不发达……但中国并非没有信仰……但实际上作为民间信仰的神鬼巫崇拜一刻也没有中断过。……说明民间信仰在中国是宗教风俗之际的重要研究对象，锲而不舍且暮以之，必定会有出色的收获。”^②民间信仰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反映和渗透了中国区域社会的诸多方面，对它的研究必将呈现区域社会中的各种因素和区域发展的相互关系。

在清代陕西太白山神信仰的发展过程中，太白山神由地方神转化为区域神，成为区域共有的信仰。这个区域包含不同的地理基础和人文环境，这表明民间信仰中地方神转化为区域神的基础是一种共有的意识在起作用，这种意识即地方感，而地方感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政区。政区作为一种空间概念，它所表达的应当是区域民众对共同界域的认可，这从太白山神信仰在清代陕西的空间分布可以见到。民间信仰的传播与国家的祭祀政策密切相关，国家的认可度对区域信仰的扩展至关重要，但却不是唯一因素。促使地方神向区域神转化的是信仰的功利性或者说是实用性，这是由区域社会的地理环境决定的。在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的信

①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② 周振鹤：《序言》，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江浙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仰情感是由区域社会的重要灾害决定的，即由他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所决定的。

景观是民众信仰情感的外在表达，它的发展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景观是缘于信仰而产生，在求雨活动与降雨偶合之后，建庙的概率远大于风调雨顺之时。参与求雨者的身份也与庙宇的建造与否有着一定的关系。庙宇的选址、布局、时空分布与神明的功用和发展密切相关，却又不完全同步。民间信仰与其相伴生的信仰景观的产生和发展无法背离特定的区域社会。区域社会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各阶层的感知能力对信仰和景观的演变起决定作用。信仰、景观及区域社会，三者独立发展，又有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发掘和阐释，使我们认识传统社会末期地方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同时见证求雨事项中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这些行为与区域环境的关系又随着人的认知而不断变迁。

一方面，民间信仰作为一种发展中的事物，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区域社会的自然条件如气候、降水等，都会对雨神信仰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以行政权力和政区为主要因素的政治力量影响着信仰发展的阶段性，作为一种外力，它们决定了信仰的传播速度和地域分布；信仰作为一种区域社会的文化存在，也在发展中对区域社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一种内力的外渗。两者的合力使得信仰与区域社会发展的联系更加密切。

民间信仰及其景观的发展历程，是区域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它们只是区域社会众多事象之一，在区域社会的舞台上却透射着社会各阶层势力的涨落，见证着民众在社会发展中对所处地域自然和人文环境认知的变迁。当今民间信仰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是民众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在另一层面上，民众通过对神明的感情寄托，有利于缓解其失调的情绪，稳定区域社会的秩序。对区域神明发展历程的重现，有利于促进我们对区域信仰发展规律的认知，促进区域社会稳定发展。

二、研究现状

现有对民间信仰的研究，多以华南、江南等民间信仰相对发达的地



区为研究区域，涉及北方地区者相对较少。尽管研究区域不同，但在研究手段和方法论上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为本书研究的基础，下文分专题进行总结。

（一）民间信仰

目前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普遍采取社会史的视角，如武雅士（Athur Wolf）、华琛（James Watso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通过对汉人神明崇拜与祭祀仪式的研究，“揭示了乡村中神明信仰与仪式如何体现了王朝秩序，及其在建立和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方面的功能”^①。受国外这些研究思路的影响，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民间信仰展开研究。

民间信仰是与制度性宗教相对而言的，它的产生是基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背景而出现。周振鹤认为：“在我国，民间信仰的性质介乎宗教与风俗之间。当某种民间信仰还只是具有纯粹的民间——或曰庶民——性质，而且仅限于在局部地区流行时，与风俗的其他形式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完全可视作风俗的一部分。……但是当某种民间信仰具有全民的性质，而且信仰范围扩大到相当的地域范围时，就有可能向国家宗教转化。因此，在民间信仰与国家宗教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民间信仰向国家宗教转化的关键在于政治权力的承认，得到承认的则成为正祀，列入国家祭典。”^②刘黎明认为：“民间信仰不是指群体的信仰，而是在某一个生活空间中的信仰，这个信仰的人有可能是平头百姓，也可能是政府官员、高级知识分子。”^③由此可知，民间是一种地域概念，而非信仰主体身份的限定。在这个意义上，民间信仰就应当与国家信仰相对应，即民间信仰的神明一定是地方神而非国家神，这似乎有失偏颇。国家神和民间神的界限正如周振鹤所言，是可以转化的，并

① 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周振鹤：《序言》，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近世江浙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③ 皮庆生：《“中国民间信仰：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与立场”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宗教研究》2008年第3期。

非对立。

“民间”的概念，是相对于“官方”或“正统”而言。蒲慕州认为：“我们现在所能运用的资料尚不足让我们分辨出在当时社会上下阶层中的宗教现象有何不同，因为我们所能用的材料，尤其是文字资料，基本上都是上层社会所留下的。”^①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是以官方活动为中心，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社会各阶层的信仰是相同，这种认知是不全面的。近期历史人类学者普遍采用的“田野调查”，已经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缺乏下层资料的缺憾，使得进一步深入民间成为可能。韩森认为，民间信仰主要是为不识字的民众所信奉、所参与的一种宗教。它存在于社会的基层，其教义大多由民众口头相传，并无付诸文字的经文，韩氏指出选择的实用主义原则：惟“灵”是从^②。韩森对民间信仰的界定更符合中国的实情，民间信仰的特征，就在于它与宗教的教条式经文、规范化仪式的对立。

对民间信仰的产生，有如下几种观点：发生论，是对民间信仰产生的诸种条件加以科学概括的理论，它涉及思维条件、社会机缘、宗教背景、文化传承、生存方式、族种等范畴，其中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成分，从无形的信仰中找到其生成的有形轨迹；功能论，是对民间信仰赖以产生、传承的内在动因——主体的精神满足或生活需要加以概括的有关理论^③。在民间神明形成过程中，这两种理论各有其合理性，但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并非非此即彼，很多情况下，它们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根本上讲，信仰主体的生活需要，在更多时候是受到生存方式的影响，而生存方式则决定着主体的文化传承，既而影响其思维条件，在此基础上主体的精神才能得以满足。蒲慕州认为，民间信仰的形成，除历史人物故事的演化之外，更有由于人们在一时一地的误解和轻信一些非常现象而造成的^④。韩森把地方上诸神的形成过程与商业、商品流通

①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第一版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② （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译者前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③ 陶思炎，铃木岩弓：《论民间信仰的研究体系》，《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④ 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页。

相关联，她把商人阶级在移风易俗中的作用放在首位。对于南方地区而言，商人或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神明的发展，但这并非是根本力量，实用性一定是民间神明发展的最根本因素。

民间信仰中神明的性质，是由接受信仰的地域范围来确定的。金井德幸对“土神”的定义是：把它想定为处于县级城隍神与村级土地神中间的，属乡一级的神灵。而滨岛敦俊认为，“土神”基本可以定义为：产生于某一地区，并有着该地区特有的灵异传说，因而在该地受到信仰的地方神，其对立的概念可称为“全国神”，土神的地域范围有大有小，有村落层次上的土地神，也有乡镇、县级层次上的，甚至更为广阔的领域上的“土神”^①。韩森则将神分为当地神、区域神、全国神，在外力的作用下，当地神和区域神都有向上一层转化的可能。国家神是以国家政治力量扶持，其信仰的地域范围是国家行政力量所波及的地区，这是它与区域神或地方神的根本差异。

民间信仰的对象多为地方神或区域神，神明的功能是民众选择的基础。神明功能与地域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相关。朱海滨认为：“在科技文明发达的古代，面对不可测的自然力，人们求神拜佛的主要目的是消灾去难。……因此，崇祀那些能够免除各地自然灾难的神灵，便成了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②神明功能的来源则因神格不同而有差异。韩森认为神明灵验与否，与由庙像供奉等所体现的受重视程度成正比，人神关系完全受人的希望所左右。她通过对不同时期四个区域性神明庙宇分布的比较表明，新庙宇的增加是沿水路推进的^③。区域神崇拜的扩展最先都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观点对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是有价值的，但对数千年来发展较为缓慢的北方地区而言，有失公允。林拓认为，神明的灵异功能是信仰形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神明的灵异则依据地域社会的需要不断予以扩

①（日）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②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江浙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8页。

③（美）韩森著，包伟民译：《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译者前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7页。

充，一旦失灵，又可以及时调整，显示出极强的伸缩弹性，神明也由此获得永生^①。这是南方人格神的发展通则，江南的总管、李王等神明都随着祭祀政策而改变灵异事迹。而对于自然神而言，它的灵异多数情况下是由其自然基础决定的。

对于神明发源地特征的研究，目前较少见到。林拓认为，神明策源地的区位特征，是从区域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渐次演变为区域经济的次重心（核心）和区域文化的次重心，与区域行政、文化中心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并与信仰的地域扩展及信仰主体的逐步确定，具有深刻的共生性和共时性，他将之概括为“边缘—核心转换”特征。它是区域市场体系及地域网络发展的产物，是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治在空间结构上的曲折反映^②。林拓以福建为其研究地域，其神明策源地的特征是明晰的，对北方民间信仰不甚发达地区的神明策源地则少有提及。

地方神、区域神的发展是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在中国南方地区，韩森认为区域神崇拜的扩展最先都出现在经济发达地区。在对江南农村诸神的研究中，滨岛敦俊认为，明朝的祭祀政策是地方社会改变神明职能的重要依据，明初制定的原理主义祭祀政策，整顿了当时的信仰体系，致使国家所提倡的“当为”与地域社会中的“实态”存在明显的乖离^③。而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商业不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民间信仰的扩展也不以此为根本。传统社会中，北方社会一直以农业为经济发展的基础，绝大多数民众没有流通，民间信仰的传播路线是以何种因素为主导，是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问题。对于陕西而言，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致使陕西各地社会风尚的变化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从明代中叶起，崇尚奢华的风气首先在西安府兴起，经明末清初的演替，至清代乾嘉时期扩展到陕南汉中谷地一带。这种变迁与明清两代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几乎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率先移风易俗的就是商业活

① 林拓：《地域社会变迁与民间信仰区域化的分异形态——以近 800 年来福建民间信仰为中心》，《宗教学研究》2007 年第 3 期。

② 林拓：《“边缘—核心转换”：区域神明信仰策源地的形成及特征——以福建为例》，《宗教学研究》2005 年第 3 期。

③ 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转引自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江浙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6 页。

动最繁盛的西安府地区；紧随其后，是经济作物种植大规模发展的汉中谷地^①。这种风尚的嬗递与区域社会的民间信仰是否相关，是值得关注的。同时，中法国际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与社会组织》中，介绍了陕西蒲城县的尧山圣母信仰。这些研究都从作者所关注的点出发，主要是反映民间信仰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②。这些研究成果对陕西的太白山神信仰来讲，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套用这些原则无疑是不能充分的解释民间信仰在北方社会发展中的多面向和特殊性。

民间信仰是有其地域基础的，朱海滨认为，某一信仰要在一地存续并发展下去，需要迎合中央政府的祭祀政策，不断对信仰对象的生前事迹和影响地域范围做出调整，同时随着时代信仰主题的变迁，也需要不断制造出新的灵异传说；不同区域之间的民间信仰，存在相互影响的状况；同时在民间信仰的形成、传播过程中，僧侣们、士人阶层都是不可缺少的参与者^③。而在北方地区，民间信仰的发展和参与者却不尽相同，地方社会的力量相对有限。

（二）中国古代求雨信仰研究

中国自古以来旱灾频发，这对构成整个国家社会文化基础的农业生产造成巨大损失，威胁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正常运转。从上古时期开始，人类在与旱灾的抗争中，形成了广为流传的求雨习俗，至今尚有遗存，成为一项重要的农业禳灾方式。祈雨是在出现旱灾，且影响到人们生产生活，继而采取的一种消极的抗旱方式。中国北方内陆地区大气降水严重不足，而且缺乏河流和湖泊等储量丰富的地表水资源，人们常年面临旱灾的威胁，干旱一直是影响这一地区乡村生存和发展的普遍问题。这一现象早就受到灾荒史研究者的关注。庞建春认为，邓云特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是近代中国最早系统研究灾荒史的专著，在此

① 张晓虹，郑召利：《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嬗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 秦建明，（法）吕敏编著：《尧山圣母庙与神社》，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③ 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江浙民间信仰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8页。



书和大部分的灾荒史研究中，都提到传统的天命论、卜雨、祈雨和水神崇拜在旱灾史上的表现，这些表述大多只涉及中上层官方主持的信仰活动，对于更为普遍和具体的基层社会自在状态的抗旱的信仰行为和思想言之甚少。而以往有关神明及其崇拜活动的研究中，多谈论信仰在精神层面的表现，不将信仰的成因、形态和性质与相应的物质文化和组织文化联系起来进行分析^①。以往对祈雨的研究成果虽多，但深入者甚少。

有关中国古代求雨习俗，已有论文近百篇。目前的研究大多停留在表象上，主要是对求雨史的脉络做了回顾，多是对祈雨方式的陈述，具体区域性的研究较多，涉及区域有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和甘肃的天水、陇右一带，而其他地区鲜有涉及，求雨的方式因地制宜，但这种差异的原因甚少被论及，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尚未有对全国各地的求雨习俗做系统的论述和分析，对各地的求雨习俗与当地的环境、人文因素的关系，缺乏系统论述和分析。纵观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对求雨习俗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主要表现在：

（1）研究时段的不连贯性。中国的求雨习俗源自远古神话中先民对自然的模糊认识，学界对各种习俗的起源多有论及。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汉、唐、宋、明、清及近代，其他朝代的研究较为罕见。这与社会兴衰有关，也与目前学界热衷于盛世研究有关。求雨习俗在中国历史上是未曾中断过的，盛世时的帝王都是求雨活动的主导者，乱世时的帝王与民众是如何应对旱灾的，求雨习俗是如何延续的？同时，目前多数研究关注的是某一或某些朝代，各种习俗随时代而演变的轨迹很难被认识到，这对于我们认识求雨习俗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较为模糊，这是由目前研究的朝代不连贯造成的。

（2）研究区域的不平衡性。近代以前的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以农业为本，旱灾是整个历史时期所有地区都要面对的灾难，求雨习俗的存在是相当普遍的。目前的研究在区域上是不平衡的，主要集中于华北

^① 庞建春：《旱作村落雨神崇拜的地方叙事——陕西蒲城尧山圣母信仰个案》，曹树基主编：《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



地区、黄土高原东部地区，江苏、浙江、两广、福建开始被涉及，而四川、贵州、两湖、江西和广大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鲜被提及。首先，这种区域不平衡性与旱灾对各地发展的影响不同有关，灾情的大小决定人们对求雨的热衷程度。其次，这与各地的资料遗存有关。资料遗存是进行求雨习俗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具备这种基础的地区才能广泛展开研究。最后，与研究者的志趣有关，研究者所选择的区域应是他们认为相对特殊且较为熟悉的区域，这些是造成目前求雨习俗研究区域不平衡的原因。广大的西部地区是我国环境脆弱的地区，对气候的感应更为直接，对该地区求雨习俗的研究重要性自不待言，对其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也应引起学界的关注。

(3) 研究的深度不够。早期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的介绍各地存在的求雨习俗，对其渊源、所代表的文化含义甚少涉猎。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一些解释性的研究，开始追溯某种习俗的源流及其区域特点。21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求雨习俗中国家意识在地方的渗透，求雨习俗与当地气候、水资源、区域文化的关系，但这类研究在目前只是凤毛麟角，只能代表目前研究的较高水平，参差不齐仍是目前求雨习俗研究的现状，大多属于介绍性的研究，这是该区域研究深度不够的表现。

求雨作为一种习俗，它的产生、发展、变异能够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对它的研究是极富意义的，今后的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 从多角度来认识求雨习俗。求雨事象不只是一种民俗和抗旱措施，它更是一种与生态、文化、人类、社会有关的事象，今后对它的研究应从多种角度展开，得出一些更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真实的结论。

(2) 对求雨习俗功能的研究。求雨习俗的性质已被涉及，是一种消极的抗旱措施和民俗，各种因素都对其产生了影响。求雨习俗在适应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的同时，不同时段内对区域社会的发展必将产生不同的作用。这种影响的大小、利弊等鲜有论及。因此，把求雨习俗放在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中，考察求雨习俗如何适应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使其更符合当地的社会实际，同时求雨习俗对当地的社会发展的影响应被充分重视，这必将为求雨习俗的研究开拓一个新领域。